

不只是一部甲壳虫的全球史

——《甲壳虫的全球史》译评

■ 乔爱玲



《甲壳虫的全球史》
[德]伯恩哈德·里格尔著
乔爱玲 柯明译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作为《甲壳虫的全球史》译者,我在几个方面感触颇深,其一是书的内容丰富扎实,其二是作者的严谨性,其三是选书决策者的眼光和品位。说到内容,起初我猜想,这应该就是一本写一款小汽车兴衰过程的书而已,将其称为“全球史”,并且还获得了哈格利商业史奖,未免有点夸张之嫌。然而,随着翻译的深入进展,我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当初的轻慢转变成对作者的肃然起敬,我深深地感受到这部小汽车的历史之书的厚重、丰盈、客观、详实。

《甲壳虫的全球史》显然是以甲壳虫汽车的历史为主线,其创意起因、研制投产过程、繁盛时期的生产销售两旺态势,到衰而不退、退而不出结局,令人观之叹服、回味无穷。此书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想必是因为作者不是站在地平面上来讲述这款甲壳虫汽车的故事,而是站在一个历史的综合的高起点上来纵览甲壳虫在全球范围内的历史变迁的缘故——讲的是甲壳虫汽车的全球史,但又不仅仅限于这款汽车的发展史。书中所涉及的那段与甲壳虫汽车兴衰过程密切关联的历史上又绕不过去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迁,以及由此直接或间接引发的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都会令人不由地产生一种置身于彼时彼刻的历史河流之中,全方位地体验这段历史所发出的冲击力的感觉。从而明白了为什么这款小汽车会由“初生的”简陋发展为羽翼丰满的宠儿,再到被许多国家竞相将其视作宝贝,以及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当作

自己国家的图标缘由的同时,收获了一份对近代历史的了解。

“史”之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客观性和真实性,《甲壳虫的全球史》的可贵之处之一就是如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背景。文中没有主观臆断,没有闪烁其词,没有为了某种目的而刻意对甲壳虫汽车历史进行美化或丑化的痕迹,更没有政治上的刻意为之,抑或是掺杂某些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意图,因此,读起来可信度极高。

除了以上的特点外,此书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其他几条次主线,如国际局势和商业背景次主线。该次主线从“一战”开始讲起,谈到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状况,继而又一步一步地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论述“二战”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条件在困境的缝隙中求生存,以质量创口碑,洗掉战败国的丑陋印记,并低姿态地把德国这只“骆驼的脑袋”伸进国际市场这个大“帐篷”里,进而神不知鬼不觉地蚕食掉了小型汽车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尤其是在美国和墨西哥市场,最终一跃成为诸多小型汽车中的主流产品,将美国福特产的风靡一时的T型小汽车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这一过程的陈述脉络十分清晰,显示出作者极强的历史

研究和叙述功底。

作者在书中埋下的另一条不容小觑且贯穿始终的次主线,便是甲壳虫汽车文化意义的变迁。由书中得知,甲壳虫汽车最初吸引眼球的不是现代女性所欣赏的其外观设计上的独特性和由此而展示出来的张扬个性,而是汽车的实用性,如汽车的价格、实用价值、性价比等,在车主心目中它就是一个要求不高、能载人又能变形使用的“金刚”。可见,那时的甲壳虫汽车文化突出的是一个简单的“实惠”。后来,由于这款汽车的制造特点,使得车主有了展示自

己个性特点的机会,于是,甲壳虫汽车便有了千面性,路上跑的都是甲壳虫汽车,但又不都是甲壳虫汽车,究竟是什么,完全因车主而异。车主们爱上了随意装饰自己的爱车并乐在其中,生活中也因此而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创新和装饰汽车的乐趣。于是,“甲壳虫”由“实惠”变成了生活中的乐趣。再后来,这款“人人都买得起”且具有多用途的小汽车,逐渐进入了中产阶级家庭。这只小小的“甲壳虫”便成了用于休闲娱乐的“小可爱”和校园游戏比赛的道具,创造了情人幽会或个人静心的私密空间,成为怀旧的精神寄托。最后,“甲壳虫”变成了现如今体现时尚追求、张扬个性的一种载体,并因此受到了人们尤其是女性的大力追捧和青睐。此时的“甲壳虫”再次破茧,升华成精神上的一种追求。

文中这些叙事主线既相对独立,同时又相互交织渗透,充满着浓浓的史实——丰满的事实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让人产生一种不读完此书誓不罢休的感觉。特别是当文中所陈述的内容都是建立在充足的事实基础上、经过严谨的逻辑演化与陈述而来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变得越发强烈了。

此书还有一处不容忽视的,

就是作者严谨的态度。这一点,在作者的书中和书后的注释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全书共349页,而注释就占了54页(共447条)。凡是书中提到的东西,无论是某种说法、某个例子、某个数据乃至某件事,不仅详实而且都有案可稽。换句话说,通篇内容没有一点来自主观臆造,更没有拼凑或造假的痕迹,即使是得出什么结论,这个结论也一定是建立在以事实为依据、以逻辑分析为主导的基础上的,是水到渠成的,令人信服,也突显了此书在“史”的层面上的可信度和价值。

另外,从“致谢”部分也可以看出,为了写好这本书,作者曾遍访与之相关的国家的图书馆、资料室和档案馆,查找资料,甚至还长途跋涉到当事者所在国对其进行采访、实地考察,以及征求匿名读者对书稿的建议等。经过如此一番过程撰写出来的书,一定是“货真价实”的,是实实在在的甲壳虫的全球史的硬核。

此书作者伯恩哈德·里格尔是德国当代著名学者、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教授,《甲壳虫的全球史》是他的代表作,并获得了哈格利商业史奖。我想,作者之所以钟情于这个选题,并为之投入如此之多的精力和时间,应该是看中了这一主题的研究价值、久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效应。历史的传承是需要有人为之付出努力的,不然,就会被历史的洪流淹没而断裂,如果是那样的话,将会是一个极大的遗憾。甲壳虫汽车的历史由于作者的努力而“活了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

为即将“绝版”的历史留下一份个人记录

——读《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

■ 唐骋华

人类关于往昔岁月的叙事是有套路的。比如,现在只要提起“大上海”,无外乎这些关键词:法租界、石库门、花园洋房、咖啡馆、西餐厅、老克勒、海上名媛……所谓上海者,仿佛全由上述符号构成。

然而我相信,此种叙事套路和很多“上海小囡”的生活经验并不符合。譬如,我的成长环境就同西餐、洋房之类相去甚远,这些符号基本不会在我的视野里出现。我对它们的了解,毋宁说是受叙事套路的影响——以为如果一无所知,也太不上海人了。即便如此,它们于我更像是某种“外部知识”,而没有完全地进入日常生活。

因此,每当我读到“言必称法租界”的文章,总觉得隔膜与矫情。据我所知,上海人的生活不乏多样性,可怎么一落笔,就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所幸这些年情况有所变化,不同的声音开始浮现。前一阵读沈月明的《沪乡记事》,他笔下的南汇风情让人领略了大上海还有乡村的一面,而近期出版的管新生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则更令我感到鲜活和亲切,因为我自己就曾居住在广义的工人新村。

显然,工人新村所呈现的样貌与流行套路很不相同,我想,这也是管新生为何要强调“另一种叙事记忆”的原因。这是一种与咖啡、洋房绝缘的记忆,甚至和弄堂

生活也有较大差异。这就要追溯下工人新村的来龙去脉了。

上海的工人新村建设始于1950年代初,代表作即曹杨新村。从建筑风格看,它跟新式里弄、花园洋房等海派经典住宅不同,更重要的是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的住宅主要供富裕阶层、中产阶级居住,劳工的境遇则要差很多,据统计,新中国成立时上海300万产业工人及其家属住在简陋而拥挤的棚户、厂房、旧式里弄里。因此,待秩序重建,新政权着手为工人“量身定制”住宅区,即工人新村。据学者统计,从1953年到1958年,上海一共兴建工人新村201个,住宅面积达468万平方米,极大改善了工人的居住状况。

此举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工人从旧社会的苦劳力变成新社会的主人翁,社会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所以,入住工人新村是件大喜事,本书记录下的一句口号便是其生动写照:“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很多劳模是戴着大红花、在锣鼓齐鸣的喜庆氛围中乔迁的。

作者还观察到,工人新村的选址同样有讲究。普陀的曹杨新村,邻近华东师范大学;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周边,坐落着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理工大学。这种安排,是为了使“工人子弟的

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清晰地表明了新政权的执政基础及价值取向。

作者本人于1954年10月随父母移居控江新村,他家分到的是一居室,使用面积近14平米,卫生间、浴室、厨房、阳台均为公用。按今天的标准只能算蜗居,而在当时已经是“升级”了。那时候没搬家公司,作者父亲拉着一辆又长又大的双轮人力车,载着全家人一个劲往前跑。辛苦归辛苦,但一路上欢声笑语,全家人为居住条件的改善而雀跃。

其实从地理位置而论,作者是从市区搬到了郊区。之前作者家住常德路,妥妥的“上只角”;而控江新村所在区域尚属近郊,一派田园风光。事实上,工人新村几乎都位于大上海的“边缘”,某种程度上,工人新村的兴建同时意味着上海城市化的拓展。

落到微观层面,这些在工人新村长大的小孩,有一段独特的生活经验。作者在书中描述道:“控江新村时属大杨浦的上海郊外,隔着营口路与一大片碧绿的田野遥遥相望,有着清清的河水、高高隆起的坟墩头……”儿时的作者,经常同小伙伴们一起在田野间撒欢,放风筝,下河游泳,捉鱼,捞浜,整天“疯玩”。他们对大自然,绝不似今天城里的孩子那般隔膜。

长此以往,难免熏陶出些野性来。作



《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
管新生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者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编剧,不过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他跟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可大不一样——言语更粗粝、更接地气,对生活中的暗角也有更多阅历。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你和一位中年大叔聊天,觉得对方路子有点“野”,那他很可能就是在工人新村长大的。

只可惜,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工人新村早就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其区位条件和居民构成,已然天翻地覆。相应的,半田园式生活和“野路子”大叔也快要绝版了。

如今想来,工人新村实为一种过渡性质的居住模式,它介于1920年代兴起的里弄模式和1990年代兴起的小区模式之间,是应时代的特殊需要而出现的产物。因此,当时代发生变化,尽管名称得以延续,但其内涵和性质就今非昔比了。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作者用亲身经历,为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留下了一份鲜活的个人记录。